



动力不足 焦海洋作



懒 张建辉作



# 中国不需要『未富先懒』

## ①“家里蹲”成了理想职业

来自山东青岛的任炳最近很是苦恼。他今年已经换了两次工作，没有一份做得称心如意。他对本报记者直言，“其实什么工作我都不喜欢，最理想的工作是待在家里，什么活都不用干。”

作为“农二代”的任炳，肩上的担子一点都不轻。父母帮他的兄长娶亲后就告诉他，无力负担他的人生大事，但也一直催着今年27岁的他早日结婚。

在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里，任炳并非孤例。他发现周围不少朋友都像他一样，向往一份轻松又赚钱的工作。在深圳市航盛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于世杰看来，尽管工资在上涨，但这一代工人“未富先懒”，没有以前的工人努力。

一些城市居民也开始有了“很多不愿意干的事情”。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丁元竹分析说，在一些大城市，一些市民要么靠租房为生，要么凭市民身份拿到相关营业执照，出租给前来打拼的外地人，甚至还能申请社会救助，“这种情况下，他们会觉得，我凭什么还去工作？”

在有关专家看来，就连公务员群体里也有这种现象。有些公务员很讲究“廉政”，但却不重视“勤政”，有人将工作视为“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”。中纪委官网每月通报的案例中，总有一些公职人员因为上班期间玩忽职守或是娱乐而受处分。

“二代”变懒现象同样值得警惕，不管是“富二代”、“拆二代”、“农二代”还是“官二代”，近年来屡屡以颇为负面的形象出现。“富二代”不愿创业，花天酒地的新闻屡屡见诸报端；“农二代”不会务农，到城里后又挑活，在用工荒情况频频出现时更为挑剔；“拆二代”则仗着家里的房子不思进取……

不同群体中，都有人反映这个问题。例如设计行业，设计师王政强就曾批评一些同行，“设计做得一般，倒是物质享受、对享受有了更高的要求，这是很浮夸的作风。”

在接受记者采访时，南开大学社会建设与管理研究院院长关信平教授直言，许多年轻人从小比较安逸，长大了父母也给钱，没有急迫的压力，将更多精力用来追求享受。

“随着国家经济水平的提高，人们的收入增加，生活水平得到改善，不会像以前需要维持生存的阶段那样，把更多的时间用来努力工作了。”关信平认为，“在世界范围内，这都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趋势。”

人的“懒”还体现在身体层面，长期困扰欧美国家的肥胖问题，如今出现在了国人身上。此前，卫计委发布的《“健康中国2020”战略研究报告》显示，全国83.8%成年人从不参加业余锻炼。尽管有许多客观因素，但在分析人士看来，这主要还是因为主观上的惰性，“非不能也，是不为也”。

## ③拒绝“未富现象”蔓延

事实上，在舆论对社会现象的总结中，“未富”并不仅仅指向“先懒”，还有“未富先老”、“未富先炫”、“未富先累”等多种在国家“未富”的大前提下出现的社会问题。

与许多国家一样，随着经济的发展，我国的代际差异在日渐凸显。专家认为，改革开放之后出生的很多年轻人，跟老一辈人不一样，没有见过匮乏的时代。他们从小吃穿不愁，没有改变生活现状的急迫压力。“但还是应当提倡艰苦奋斗，年轻人一方面要更努力，另一方面要靠智力去创造更多价值，而不是靠时间和体力的大量付出。”

同样重要的是，解决“未富现象”，贫富分化问题需要解决。关信平表示，社会中有一小部分达到“有钱有闲”程度的群体，对社会的影响很大。而满大街的消费品、星级酒店等高档消费方式，以及电影、电视上琳琅满目的生活方式，都吸引人们去模仿。

“需要从社会层面去解决。国家应下大力气扫除权力滥用、裙带关系等障碍。”顾骏认为，如今，需要在宏观层面着力解决社会公平的问题，继续为每个人提供奋斗空间。“政府需要创造条件，让所有劳动者都能看到生活变好的可能性，让群众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。”

事实上，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，提出的60项改革任务已启动至少39项。而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褚松燕看来，这其中绝大部分回应的都是社会关于“平等和公平”的关切。

“改革的问题都不是孤立的，政府要营造好的发展环境，就要限制权力，列出权力清单，反对腐败。”褚松燕告诉本报记者，“无论推出户籍

制度改革，还是限制国企高管工资，都让群众看到了政府的决心。”

伴随着社会现象的出现，中国也在积极求变，适应变化了的劳动力市场与社会心理。

中国发展的驱动力在变。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，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刘尚希告诉记者，过去靠廉价劳动力驱动的人口红利消失了，未来经济增长依靠的是创新驱动。

伴随着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对工作的越发挑剔，是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值的减少。这一现象自2012年就已出现。而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里，这一趋势都会继续。

“未来30年的辉煌要靠劳动人口更好的教育和技术背景，为此，要改变城乡教育水平差异等很多方面，提高人的平均水平，让社会阶层能流动起来。”关信平认为，每个人都能看到希望，是“未富”的中国走向富裕的前提。

最应该推崇的，是中国勤劳致富的传统。“需要给全社会尤其是年轻人说清楚，中国虽然GDP世界第二，但离我们的发展目标还有很大距离，大家还要努力。”关信平认为。

顾骏认为，中华民族自古以来，一直都有给普通人奋斗空间的传统，改革开放以来许多人也因此“富”起来。如今，进入全面深化改革阶段，同样需要在政策环境等多个层面，为普通人创造这样的条件。

“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，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，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，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。有梦想，有机会，有奋斗，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。”早在就任国家主席时，习近平就承诺。

## ②他们为何“累觉不爱”？

“累觉不爱”是去年底开始流行的网络用语，意为“很累，感觉自己不会再爱了”，被网民用来形容身心俱疲的状态。

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顾骏看来，“未富先懒”的核心是价值观问题。“如果一个人只把勤奋看作是致富的手段，那么有了钱就不会再去奋斗。但如果一个人觉得奋斗是快乐的，即使没钱挣也会很幸福。”

“‘未富先懒’问题首要的不是人们富不富，而是要审视，当下的社会是否给个人奋斗设定的门槛越来越高，给个人奋斗的空间是否让人觉得有动力。”顾骏告诉本报记者。

即使为很多人所羡慕的高校教师职业，也让许多“围城”内的人直呼“累觉不爱”。从今年8月开始，麦克斯研究院联合腾讯对在校大学教师进行的调查显示，约八成教师表示承受的压力较大，而压力大的首要来源，则是“个人财务状况”。

“产业落后，欲望超前”。联友电讯董事长王学宗这样形容新生代农民工遇到的困境。“应该给这些农二代再培训的福利，提高劳动技能，创造更多的更有意思的就业机会，给他们安排城市

居民的社保，给他们城市永久居民的归属感。”

丁元竹向记者表达了类似观点。他认为，不能随便将“懒汉”帽子扣在许多劳动者头上。“新生代农民工并不是真的懒，而是他们的要求变了。”

事实上，这一现象在世界各地均有出现。在英国，有所谓NEET族，指的是16至18岁间有一部分人，既不上学也没工作，而且没参加职业培训；在日本，NEET族的范围扩展到15至34岁；在美国，这一群体被称作“归巢族”；在香港，将其称为“双失青年”（失学兼失业）。

“一定要从具体人群出发，才能有的放矢。”丁元竹表示，在美国，可以利用大数据等智能化的方式对每个人的性别、家庭、文化背景等进行分析，看相关群体会出现什么可能的状况。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发达，完全可以把各群体的信息精确化，从中找出相应的解决办法。

在关信平看来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，以及技术水平的提升，很多人开始在一定程度上“有钱有闲”，在主观上追求一种舒适休闲的生活方式。问题是，当下中国还没有到发达国家的程度，在这方面尚没有条件完全效仿。

“人均年收入6000多美元的中国，现阶段不能去跟人均年收入5万美元的国家攀比，即使有一部分人有这个条件了，也不适合全社会效仿。”关信平如是说。



## 明日未至，懒惰不可至

申孟哲

就整体而言，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勤劳的群体亦不为过。长期的农耕历史，悠久的忧患意识，以及人口巨大带来的生存压力，都在我们的民族血液里种下了勤劳的基因。如果没有勤劳致富的意识，很难想象中国这条巨龙如何走过这30多年高速发展的历程。

然而，所谓“未富先懒”的现象，也正成为我们不得不正视的问题。

笔者曾听说过发生在家乡的一个故事：一个男孩到了学校门口，不愿意进去上学。父亲大怒，就在校门口教育起孩子来。孩子的爷爷看不下去了，对孩子说：不想上就别上了，等咱家的房子拆了，根本用不着上学。

“拆迁致富”的前景，是支撑这位老人“用不着上学”论的最强有力论据。说是溺爱也好，有恃无恐也罢，反正老人心里，孙子是用不着像他的祖父辈那样辛苦而勤劳的。

如果说“拆二代”中的懒惰现象并不能完全称为“未富先懒”的话，那么我们来谈一些“农二代”“穷二代”身上的同样问题。

新一代进城务工人员，已经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。这批以“80后”、“90后”为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，相较于他们的父辈，已经失却了对农村和土地的天然附着。他们属于城市和农村间的夹缝——除了逢年过节归乡，大多数时候，他们的身体和心灵都属于城市；但在城市里，相对贫穷的他们也找不到归属感。他们的休闲娱乐项目是什么？一位在深圳的

本报记者 刘少华

制图：潘旭涛